

(学会内部交流, 非卖品)

胡适研究通讯

2011年第4期(总第16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11年11月25日

目 录

也谈胡适的《容忍与自由》	耿云志 (1)
胡適書信補佚——1951 年三封與臺灣大學有關的中文信	劉廣定 (11)
胡适的圣经收藏	邹新明 (16)
胡适收购 Robert Lilley 旧藏始末	邹新明 (23)
胡适在韩国的九十年	金瑞恩 (27)
胡适与孙中山	(44)

也谈胡适的《容忍与自由》

耿云志

一

胡适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领袖。这是一般学者们都认同的。但1959年3月、11月，胡适两次发表文章和演说，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于是引起不同的反响，即使在自由主义者中间，也有不同的意见。

胡适的《容忍与自由》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1959年3月）上发表后，他的好朋友，毛子水即在接着的下一期《自由中国》上发表《〈容忍与自由〉书后》，对胡适的思想加以申述和发挥。同期上又发表殷海光的文章《胡适〈容忍与自由〉读后》，承认“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贡献。这篇文章的意蕴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但他指出：“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他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多向这类人士（指统治阶层的人士——引者）说法”。显示他不赞成笼统地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去世不到一个月，周策纵在《传记文学》（第55卷第4期）上发表《胡适之先生的抗议与容忍》一文，对胡适的容忍话题作了很全面的论述与深入地剖析。他说：“我们仔细检讨胡先生的一生，可以肯定地说，抗议和容忍实在就是他的基本态度与精神。”他指出，单强调容忍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用容忍与抗议两个轮子来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基本态度和精神’”。从文中可以看出，周先生注意到了，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和发表同题讲演的时候，和他早年的态度，“有程度上的差别”。他还指出，“胡先生似乎比伏尔泰更偏向于容忍一方面”。

相隔五十年后，大陆有两位青年学者，在各自的著作里论到当年胡适关于“容忍与自由”的话题。何卓恩先生的《〈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3月）只是作为一段史实简略记述胡适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未加深论。李建军先生的《学术与政治——胡适的心路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一书，论到胡适的关于“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和讲演时，他完全赞同胡适的主张。

上面提到的各位学者，虽其议论微有异同，但都未曾从史实与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胡适所强调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议题作深层的探讨与解析。本文想就此略谈一点意见。

我的意见大致有三个层面：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并非胡适的一贯的明确主张。二，从自由主义理论原则上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是难以成立的。三，胡适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强调这一命题？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谈谈我的意见。

二

胡适一生都在努力争取自由，争取发表言论的自由，争取批评政治的自由，争取批评政府，批评所谓党国，批评所谓领袖的自由。他为自己争这些自由，也为教育界、学术界，为青年，为同胞争取这些自由。他的努力不能说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胡适的争自由的努力，早在上海读书时期就已开始。在澄衷学堂，为了自由，他为一个被开除的同学力争，力争不得，他罢学而去。在中国公学，为了自由，他积极参与学生争取自治的运动，虽未被开除，却在自动退学之列。他们一群青年，在艰苦蹉跎中苦撑起一个自己办的新公学达一年之久。

到美国留学后，他的眼界开阔了，知识增加了。这时期他受到美国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基督教家庭的影响，又读过自由主义大师们（主要是弥尔（John Stuart Mill）和毛莱（John Morley））的著作。他的自由主义，更增加了理性。

胡适留学归国后，从1917年9月到1948年12月，30多年中，胡适争自由的努力和谈论自由最集中的有三个时期。一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二是1929年到1930年批评国民党的时期；三是1947—1948年的国共内战时期。

新文化运动时期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自由主义风头甚健，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他的《易卜生主义》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对中国人来说，经过两千年纲常名教的束缚，争取个性解放，就是争取自由最核心的问题。胡适解释个性主义，第一是个人要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根本无从谈起。他指出个性主义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自己负责任。^①他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里重复强调这两个基本点。他说，个性主义“一是独立思想……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的责任。”^②胡适对个性主义的界定，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解说要比从前严复与梁启超的解说更加深入浅出，也更加准确。他完全从正面，从积极的意义上揭示自由的内涵。

还有，胡适向青年们指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

^① 《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5页，亚东图书馆1925年11月第八版。

^②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存》卷四，第

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①这话虽是在1930年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见到的，但说的是他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这句话实际含义，是承认个性主义是最高价值追求。这与自由主义经典思想家的意思是一致的。

这一时期，胡适没有特别强调容忍的论述，更没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话题。

1929—1930年批评国民党的时期。

胡适1926年为中英庚款的事出访欧洲，1927年回国。当时他既不见好于北洋政府，又不见容于南方国民党当局。所以，既不能回北京大学，也不能赴广州的中山大学之请。只好暂居上海。1928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极力诛杀异己，动辄给人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加以讨伐。胡适自己就曾被骂作“反革命”。^②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呈现出相当恐怖的气氛。刚刚游历过欧美国家的胡适，一下子掉进此种境遇之中，他无法容忍，乃挺身而出向国民党当局争自由。这时期，他发表多篇文章严厉批评国民党当局。如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他举出许多当局践踏人权的事实，加以抨击。最后提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③接着发表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的反自由的反动倾向。这时期，还有一些因种种原因当时未曾或未及发表的文字，也都是强烈要求自由的。如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这篇文稿里胡适说：“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又说：“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④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有看到一份写于1929年的，不完整的胡适的手写札记的影稿，看去像是预备讲演的提纲。其中有很直率地批评国民党的文字。稿子的题目是《建设时期中的根本需要及其应付方法》。稿中说：“根本需要是思想革命，应付方法是思想自由。”又说：“今日不敢自由思想的人，今日畏惧压迫自由思想的人，也正是当年受传统思想支配的人。”又说：“只有真正的自由思想，才可以做到思想革命。”“然而，思想自由不是今日所谓思想自由，可以批评上帝，

^①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635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

^② 《胡适致蔡元培的信》（1928年6月27日），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③ 《人权与约法》，《新月》2卷2期。

^④ 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

而不可以批评孙中山，这不是思想自由。可以推翻孔子、耶稣，而不可以批评《建国方略》，这也不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的试验，全看我们可不可以批评孙中山与国民党。思想是只认真理，只问是非，而不认人的。”

这一时期，胡适争自由的勇气极高，言辞相当尖锐。没有特别强调容忍的意思，更没有说过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话。

1947—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国共内战全面展开，烽烟遍地的情况下，胡适很集中地，很用力地宣讲自由主义。这两年里，胡适公开发表的谈及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文章与讲演有十几次，其中比较最集中，最完整地表达他对自由主义的见解的有两篇。从这两篇文章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时期，胡适所强调的自由主义的重点何在。

1948年8月1日，胡适写《自由主义是什么？》，6日发表在《周论》的第2卷第4期上。胡适随后将它收入自己编的《胡适的时论一集》中，足见胡适自己很重视这篇文章。

胡适在这篇文章里首先界定了“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他说：“据我的愚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在这个大运动里，凡是爱自由的，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随地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主义者。”^①

须特别指出，在这篇文章里，胡氏明确强调：“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有）空前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他又强调说：“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②

一个月后，1948年9月4日，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作广播演讲，题目就是《自由主义》，次日，在《世界日报》上全文刊出。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再次强调，“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接着他就说道：“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胡适接着说：“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

^① 引自《胡适全集》第22卷第72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重印本。

^② 同上，第726、727页。

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据我的记忆，这似乎是胡适第一次公开讲论他的老师的所谓“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①的说法，并引伸发挥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至于胡适引伸发挥的意思是否在理论原则上可以成立，我们且留待后面适当地方再加分析评述。这里我们且记住，这是胡适第一次公开引证白尔（有的地方胡适译作布尔）的话，并据以引伸发挥。

那么，在国共两党战争正酣之际，胡适为什么特别强调容忍，强调容忍反对党，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是怎样考虑的呢？

我们可以根据胡适此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讲演的内容来作一些分析。

我前面说过，在我们所指的这个时期，胡适发表过十多篇文章和讲演，都讲到自由或自由与容忍的问题。而且，多半都是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着眼，来谈论这个问题。他强调，世界的发展，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自由民主的趋向，一种是一党集权的趋向。前者以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为代表，后者以苏联为代表。他在《两种不同的政党》、《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民主与反民主观念体系的冲突》、《当前中国文化问题》、《自由主义与中国》等等文章和讲演里，都讲到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的问题。胡适自己当然是认为自由民主的大趋向，才是真正符合人类发展需求的方向。他作这些文章，发表这些演讲，目的都是为着帮助人们选择这个他认为惟一正确的方向。他归纳这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自由不自由的选择，也是容忍与不容忍的选择。”^②我们都还记得，当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不久，胡适曾托请王世杰转给毛泽东一封电报，电中称“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③劝中共做和平的反对党，以成就中国的宪政之路。毛泽东和中共没有理会胡适的建议。胡适这时（1947—1948）大讲自由与容忍，自然不是指望共产党会听他的劝告。他的意思应该含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开地批评苏联和中共都是一党集权，不容忍自由批评，更不容忍反对党。另一方面，他又说给国民党听，要他们明白，要跟上世界自由民主的大潮流，要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就必须容忍自由批评，尤其是要容忍反对党。否则，就不能见容于自由世界，就不能有持久巩固的政治秩序，以保障国家和平发展，人民乐业。很明显，他这时，强调容忍，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主要不是谈论自由主义的理论原则。

^① 《自由主义》，《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9月5日。

^②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

^③ 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第3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三

自由和自由主义，是个相当宏大的思想理论问题，不很容易说得清楚。胡适是个终身坚持自由主义的人。曾写过（或讲过）许多宣讲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篇章，人们都不怀疑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但我觉得，由于他过信他年长的老师布尔的话，把“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当成普遍的理论原则，是不妥当的。

胡适解释，何以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说，这是“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容忍”真的是“自由”的根源吗？换句话说，自由是从容忍中产生出来的吗？这大值得怀疑。中国人容忍君主专制两千年，何尝产生出政治自由？美国容忍奴隶制，直到为解除奴隶制而爆发一场战争，容忍何尝让奴隶们获得自由？

这里首先须弄清容忍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在自由主义的语境里，容忍应是指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的一种态度，即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对他人的自由的容忍。绝不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一个处于他人权利控制下的人，对压制自己的权力的容忍。这种被迫的，不得不然的容忍，与自由主义所讲的容忍毫不相干。既然容忍只是自由的人对他人自由的容忍。那么，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源，说自由是从容忍产生出来，说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就是不妥当的。从而，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就是大可怀疑的。我们倒是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容忍。因为容忍是自由的人所作的自主的选择。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一个受压制或被强制的人，容忍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不得以地忍受。他所能有的自主地选择是反抗，而反抗正是不容忍。

在自由思想的历史上，我们还不曾见到哪位先驱曾表示过“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意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an Stuart Mill）是人们公认的自由主义代表思想家，他的《论自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经典。对此，胡适也是完全认同的。^①我们且看密尔关于自由的一些最重要的论述，都难以得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结论。

《论自由》一书的第二章最关重要。

密尔这里集中论述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其实只是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因为讨论自由就是思想自由。有思想自由，自然会有讨论的自由；若没有思想自由，自然也就不会有讨论的自由。

密尔说，任何压制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这种“权力”都是不合法的。不论

^① 参见张书克：《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即将在《广东社会科学》上刊出。

是一部分的人民或是其政府来运用这种权力，都是不合法的。^①他认为，“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于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②密尔认为，为着使一般人都能获得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体量，思想自由是完全必要的。^③他说道：“若要让人类的宣教者认识到他们所应当知道的一切东西，就必须让一切东西被自由地写作并印行出来而不加以任何束缚。”^④密尔特别强调反对意见的重要。在他看来，一种意见，哪怕它就是真理，倘若不经受反对意见的检验和冲击，它就会被当成教条灌输给人们。“一到那个信条变成了一个承袭的东西，而人们之予以接受乃是出于被动而不是出于主动的时候，……就有一种逐步前进的趋势会把这信条除开一些公式而外的全部东西都忘记掉，或者对它只付以淡漠而麻木的同意，……直到最后，它终于变得与人类内心生活几乎完全没有联系。”^⑤这一点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确的意见，一个真理，倘若被人为地“保护”起来，不许批评，不许讨论，把它灌输给人们。那么，它就将会变成僵硬的公式或教条，变成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反对意见并不是坏事，有分歧并不是坏事。密尔说：“如果有人对公认意见有所争议，或者如果有人只要法律或舆论容许时就会对公认意见有所争议，那么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喜悦。”^⑥因为一种真确的意见经过与错误意见的冲突，会使我们对其真确性有更明白的领会和深刻感受。

但遗憾的是人们通常都不喜欢听取反对的意见。密尔认为，“人类之倾向于把自己的意见和意向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他人，是有着人类本性中难免带有的某些最好和某些最坏的情绪的如此有力的支持”。^⑦这就是所谓人们往往都自认为自己不会错的惯性心态。它常常是导致一个人犯下重大错误的原因之一。为要预防错误，听取反对意见，与反对的意见进行公平的讨论和辩论，便是绝对必要的事情。这就需要养成容忍的态度。当然，容忍的态度之必须，并不只限于为了听取反对意见。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自由主义本身内在的要求。因为一个人的自由，需要同时承认和容忍他人的自由。否则每个人的自由都是不可能的了。

^① 密尔：《论自由》，许宝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2010年重印本第19页。

^② 同上，第19—20页。

^③ 同上，第39页。

^④ 同上，第45页。

^⑤ 同上，第47页。

^⑥ 同上，第53页。

^⑦ 同上，第16页。

在这个意义上说，容忍是实现自由的一个条件。但仅仅是一个条件而已，它不是充足条件，有容忍，未必就自由。自由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有自由意志，必须能自主选择。西方有言：“不自由，毋宁死！”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争取自由，争之不得，奋斗直至牺牲。这是自由精神。如果一个人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容忍这种状态，他就无从得到自由。反之，他反抗这种不自由的状态，那便是他的自主选择，他的反抗无论是否成功，他的精神都是自由的。所以，容忍不是自由的充足条件，不是自由的根源。因此，也就不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其实，个人对他人的容忍，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得以成为事实，是为了自由而容忍，而不是相反。况且，只有一个自由的人对他人的容忍才是有意义的。被别人强制，不得不容忍，那不是自由主义者所认可的容忍。

从上面所引述的密尔的言论，我们可以明白，自由主义者的容忍，就是承认他人的自由，承认他人有他们自己自主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说出和我们相同的意见，也可以说出不同的、反对的意见。这就是容忍，这种容忍之需要，是为着实现我们和他们同有的自由。这种容忍之可能，则是因为彼此都是自由的人。所以不是容忍产生自由，是自由需要容忍，并使容忍成为可能。

由于容忍，使我们有机会接触、了解不同的意见或反对的意见，通过自由讨论，使我们有机会评鉴我们的意见的正确与错误，或正确与错误的程度，从他人的意见中吸取营养，修正和补充我们的认识。从而，可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实现我们的自由。因为自由的实现，确实是与人的智能有关联的。这进一步证明容忍是自由的需要，容忍在现实中的实现是自由的人们共同促成的。

密尔的《论自由》所谈的容忍，只是上述意义上的容忍，他从不曾提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或者相似的意思。

我们检看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例如晚近的著名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等人，也不曾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表述。

自由与容忍，究竟哪个更重要，我以为不易得，也不必得一个普遍有效的说法。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对于个自体来说，是自由，对于个自体与他者（另一个自体，或团体，或机构）之关系而言，就是相互的容忍。

所以从历史和现实实践中，从主要自由思想家的论述中，从我们对自由与容忍的理论分析中，都难以得出结论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布尔所说的话，可能只是针对他个人对所身历的某些事件和问题的思考所得出的一种感想，算不得一种成熟的理论见解，更难说是一个普遍有效的理论原则。我们可以承认，在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基本实现的情形里，在某种场合下，强调容忍更为重要的意思，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胡适强调这句话的时候，显然不具备上述的大前提。胡适未免过信其老师的话，或许，只是为证明自己的一个特

别见解，而拉出他的老师来为自己增势。

四

胡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自由主义者，他为什么会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呢？

根据我的了解，我的印象，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胡适，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永远不使自己为“主义”所困，他总是更加关注现实的问题。面对现实的问题，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应对方式，这对于一个实验主义者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胡适在五十年代初期，也曾多次宣讲自由主义，文章、讲演都有。但没有特别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意思。唯独在1959年，两次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一次在1959年3月，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一次是同年11月，在《自由中国》社同仁的集会上发表与前文同题的长篇讲演（发表在《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

我们前面讲到，胡适于1948年关于自由主义的讲演中曾引他的老师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那时，他强调这一点是要引出容忍反对党的极端重要性，那仍是从争自由的立场要求执掌政权者要有容忍的雅量。而1959年的两度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却是要争自由的人容忍当权者的施为。如他在这一年3月发表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中说：“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①胡适这篇文章是针对《自由中国》第2卷第2期上，因刊发一篇署名陈怀琪的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而惹起政府当局的严厉打压的事情而写的。只要读一读当时有关文献，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明确看出，这是统治当局设计好的一次打击自由舆论的构陷之局。因《自由中国》是当时争自由最有锋芒的刊物。早在1956年，因登载《祝寿专号》，有批评蒋介石的内容而引致蒋家父子对《自由中国》和胡适的深深的嫉恨。到1959年，1月，当局借陈怀琪事件，要一棍子打死《自由中国》。该杂志确实到了生死关头。^②但以雷震为首的《自由中国》社的社员及其朋友们还要力争，要将政府当局构陷之局揭破。双方闹到十分难解的地步。以致胡适担心到，《自由中国》的朋友们若不“多多忍耐”，会“把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次搞垮了！”^③这话也许有“过甚其词”的意味。但台湾政权的主要后盾，美国确实一直觉得台湾不够民主，缺乏言论自由。

^① 见《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

^② 关于《自由中国》屡次与当局发生冲突的情形，何卓恩所著《〈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一书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可参看。

^③ 《雷案回忆》，《雷震全集》第11册，第74页，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出版。

此次事件如处理不好，美国对台的态度与方针政策并非没有做出调整的可能。这是胡适极力劝促雷震等人“容忍”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主要原因。到这一年的10—11月，正当因蒋介石要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的事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一方面有人纷纷劝进，另一方面有人反对。这时，《自由中国》又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这再一次使《自由中国》及其主持人雷震撞到了蒋介石当局的枪口上。无疑地，当时《自由中国》与雷震等人的处境相当危险。胡适私下里极力调停，又公开发表文章，要求《自由中国》社的朋友们以容忍的态度，避免与当局激烈冲突。于是才有借《自由中国》社十周年集会的场合，发表《容忍与自由》的长篇讲演。讲演中甚至具体批评道，《自由中国》社的某些缺少容忍的雅量的举措。在这次讲演中，胡适还极力证明，读书人，拿笔杆子的人也是有势力的。所以尤其应当有容忍的雅量。

其实，即使这时候，胡适强调容忍，意思还是为了自由，为了保住《自由中国》这块自由主义者的阵地。为了保住已有的自由阵地，暂时容忍当局的某些行为，是等待机会再作争自由的奋斗。从这种意义上说，胡适的态度，也未必就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因为骨子里还是为了自由。顶多，这句话只有策略上的较高重要性，而不能提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

极简略地说过1959年胡适两次谈“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经过情形之后，我想略作一些分析。以进一步厘清本节开头提出的，胡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自由主义者，他为什么会在这时（1959年）提出并一再强调，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呢？

大约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检讨。

一 胡适对自身地位的顾虑。

胡适1957年被任为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年回台就任。他明明知道1956年末至1957年台岛内官方舆论所围剿的主要人物就是他自己，他还是毅然决定回台就职，表明他有一种使命感，要想做事。这种心态非常可以理解。他要做事，就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以尽管他非常支持《自由中国》及其自由主义者的朋友们的活动，但他不希望弄到激烈冲突的地步。如果说，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位，还比较纯学术性，那么1959年成立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则是“国家机构”的首长。作为“国家机构”的负责人，他考虑问题时，就不可能像从前那种纯学者的身份一样。

二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台湾局势的顾虑。

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一直处于不安全感之中。对面有比自己强大多倍的大陆政权，时时宣称要“解放台湾”。1958年8月，大陆方面开始有节奏地对台实行炮击。虽然慢慢变成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但它足以提醒人们，台湾是不安全

的。在国际上，每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都是台湾面临严峻考验的关口，虽然几度都熬过去了。但这一年突然有美国一位竞选总统的候选人，扬言要改变对华政策，准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取代台湾所占据的安理会的席位，台湾仅保持普通会员国的地位。这虽然是极不现实的（海峡两岸都不会接受这种方案），但它对台湾政权无疑是一个严重的警号。^①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内部发生严重的官与民的冲突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胡适在私下里才会讲出，如不忍耐，会把台湾在联合国的席次搞垮了。其实不仅仅是席次的问题，恐怕胡适担心到如果台湾内部的离心力加强，会把这个“反攻大陆”的“自由中国”的基地毁掉。

因为以上的顾虑，胡适不能拘守自由主义常态的理论原则，而要引他的老师的话为证，证明在特殊情况下，“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自古也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说法。不过我们终究不能承认“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可以成为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適書信補佚——1951年三封與臺灣大學有關的中文信

劉廣定

六十一年前，1950年12月20日下午，臺灣大學傅斯年校長在臺灣省議會應詢時腦溢血暈倒而告不治。次年三月由教務長錢思亮繼任。事後聽說當局原擬請胡適先生繼任，但胡先生推薦錢思亮，並允盡力協助。唯胡先生如何推薦錢思亮，《胡適日記全集》並無所記。《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也只說：

……行政院院長陳辭修先生曾邀我繼長臺大……我向陳院長鄭重推薦了錢思亮先生，因為傅校長生前每次給我通訊總提到臺大之所以辦得像樣，完全得力於錢先生的協助。我還把傅校長給我的信鈔一份寄給陳院長，陳院長就任命錢先生繼長臺大。（第六冊，頁2155）

胡先生如何協助臺灣大學之校務，《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1年則記了兩條。一是六月十四日與劉瑞恆同訪哥倫比亞大學艾森豪校長，談哥大和臺大兩校醫學院合作的事；一是七月裡曾到康乃爾大學訪農學院院長梅懿士，洽談康大和

^①参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6册，第274—275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印行。

臺大兩校農學院合作的可能性。日記卻未述及。

筆者近在兩種雖已公開發表，但少人注意之資料中看到 1951 年胡適三封與臺灣大學有關的信。謹錄於後，並略為說明，以紀念胡先生 120 歲（1891-2011）冥壽。

（壹）傅斯年校長逝世後，1950 年 12 月 26 日陳誠有電報請胡適回國出掌臺灣大學。胡適元月 6 日回電後，又於 14 日寫一長函，僅見《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下）》頁 366-368：

辭修吾兄院長賜鑒；

孟真之死，真可痛惜。朋友之中，很少人能比他的天才之高，見事之敏銳，判斷之深刻；他能做第一流的學術研究，同時又有過人的組織能力；辦事能力，這樣合治學治事於一人，最為難得，也最難企及；他辦過四件大事：一是戴季陶、朱驪先時代的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一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一是抗戰後復員時代的北大，一是台大。這四處的成績都很可驚歎：我最留心他的一生事業，故深佩服他的才大心細：人或說他心粗氣豪，那是大錯的：台大的事，承兄與介公，與天放部長，都要我做他的繼任者，沈剛伯先生也有信來，說台大的師生都有這種期望，這都使我不敢不鄭重考慮：

我確曾考慮近十日之久；中間台大教務長錢思亮兄從法國開會回國，路過美國，一月二日到紐約；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也曾細細同他談過。

一月六日我托大使館代譯發一個答覆吾兄的電報…中云；「…考慮近旬日，終不敢應命。實因適最拙於人事組織，最怕行政事務。台大較北大困難更大更多，孟真心細才大，尚不免以身殉校，適有心臟病已十二年，萬不能任此煩劇艱鉅之事；乞兩公留此微軀，或尚可為國家為學問努力十年。此意至懇，千乞諒察。天放兄亦為台大事有電來，敬乞轉告為感。餘函詳。」這幾天我有幾處演說（今天星期日早八點還出去演說一次）竟不及寫詳函，罪過之至。我的覆電實是鄭重考慮的結果，是十分懇切的請求；千萬請老兄替我向總統介公及部長天放兄說明，請他們原諒，恕我不能應命之罪；

我有幾句話，電報裏不便說，現在要向老兄陳說。

（一）我在國外，雖不負特別任務，但也有點用處：一九四九年四月底我初到時，中國最倒霉，美國朝野都對中國抱「失敗主義」。有非筆舌所能爭者，（那年的六月裏，紐約一個俱樂部請我吃飯；飯後演說中國現狀，事後找才知道那個俱樂部曾有會員抗議，說請胡某演說而不同時請一個同情中共的人演說是不對的；當時此人的抗議雖未生效，然此事最可表

示那個時代中國倒霉的程度。)但我的見解日久漸漸靈驗了；北韓侵南韓戰事發生以來，了解我的意見的人更加多了；這兩個月之中，我旅行七千英里，演說十多次；比初到的一年半之中演說的次數還更多。這種談話，雖然未必有何重大的政治意義，但此時實需要一個無官守的獨立說話的人，故我為國家設想，此時不願離開美國，擬稍多留一個時期：此意近於自己說自己有用，想能蒙兄與介公諒解；

(二)台大的困難，實比北大更多，更麻煩，我決不能勝任，此實是我仔細考慮後的結論，絕非客氣的謙遜。我覺得政府應該打破「偶像」的舊見解，為台大求得一個英年有為的校長：美國近幾十年中，最大的大學往往請英年的校長。如哈佛大學現任校長柯能(Conant)生於一八九三，一九三三年被董事會選舉為哈佛校長，他那時才有四十歲。又如芝加哥大學現任校長赫欽斯(Robert M. Hutchins)生於一八九九，比我小八歲；他被選為芝大校長，是在一九二九，其時他才有三十歲：鄙意此時台大實需要一個英年有為的校長，老一輩中，如蔣夢麟兄，如梅月涵兄，都未必肯擔任這樣困難的職務；羅志希兄辦清華、辦中大，皆能樹立大學規模，能延續人才，似可供政府考慮，但志希亦不是少年人了：我深知孟真在台大兩年最得力於台大教務長錢思亮，孟真最後給我的信(十月九日)說：「思亮兄真幫了我的大忙。他是同事中幫我忙最多的，我把他累的不得了；他真是好人，又能辦事……台大這兩年招生，皆是思亮主持。其辦法之周密，中國所無……」我對於孟真贊許思亮的話，完全同意。所以找要向老兄與總統上個條陳：台大校長的人選，如錢思亮兄，實可備諸公的考慮選擇(他已定於二月五日由金山搭船回國)；他今年約有四十歲，可以做一個英年有為的校長。

(三)孟真最後信上(十月九日)說「思亮的薪水(和我差不多)是可笑的(大家如此)。他有三個兒子上學，而太太身體不好，所以比我更苦。大綵如小牛，會操作。錢太太身體太壞，故不能操作……」：這雖是閑談家務。但我深感台大教職員待遇實在太壞，實在不夠生活，校長與教務長平時已如此，何以能持久？

所以我抄此一段呈老兄，第一要請政府留意為孟真家屬料理善後的事，不可令大綵與仁軌有凍餒之憂；第二要請老兄與政府諸公留意公教人員的待遇的改善：

匆匆趕成此信；托大使館武官皮宗敢將軍帶回國上呈老兄；潦草不恭，千萬請原諒。違老兄與介公與天放兄的大命，十分抱歉，千萬恕罪：匆匆敬祝雙安。

弟胡適敬上。民國四十年一月十四夜半後。

據胡適日記，「1951年1月11日到 Calvin Forum 演說」，「1951年1月14日 在 Park Ave. 的 Brick Church 演說」。可證胡適打電報後未即回信確是因為準備演講，而非藉口。又自2月1日的日記知陳誠收到信後曾電告胡適，將選錢思亮為台大校長。此函中所言教授待遇太低，胡先生後也出力協助改善，見下文（叁）。

（貳）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1945年8月投降後，1951年始與盟國簽定和約。但中國因內戰關係遭受歧視，未得參與。臺灣大學戴運軌、劉崇鋁等教授、副教授235人曾致函胡適，請胡先生代為籲請美國教育文化界人士，一致聲援，要求美國政府修改對日本和平條約草案中歧視我國之條款。經胡先生分別致函美國各報社，請求披露後，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報均行刊出，詳簡稍有不同，其中紐約時報係將胡博士全函刊於7月31日之通信欄中，其譯文載「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32期（1951年8月23日）第一版：

紐約時報編輯先生鑑：

鄙人接到中國國立臺灣大學七月二十六日來電，簽名者有，戴運軌、劉崇鋁、洪樞、彭九生及其他教授副教授二百三十五人、請求將該電公佈於美國。電文如下：

「我們閱讀美國政府發表的對日和約修及正案後；知道根據草約第二十三條，中華民國竟將被擯於該約簽約國名單之外極感驚訝並表遺憾！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中國是第一個從事反抗日本軍事侵略戰爭的國家！中國人民為了艱苦的反侵略戰爭，堅忍不屈，貢獻其生命與財產，達八年之久，直到敵人最後投降為止。

在對日宣戰後只打了幾天，只打了幾槍的蘇聯，現在已被列入簽約國名單內，而中華民國地獨當戰爭首衝，備極艱辛，而且作戰期間，長於任何其他盟國，却被否定參加簽約的權利，我們覺得這是莫大的不公平。業已擔負自由世界領導責任的美國，一切民主國家正寄以改善前途的希望，如果允許這種不公平繼續存在，她們必將大感失望。

因此我們請你轉商美國教育文化界諸先生希望他們籲請美國政府，修改該條款，使中國能成為簽約國之一。」

鄙人對於該電所表示意見，完全贊同，且認為凡在美之愛國華僑同抱此感。倘承將此來自自由中國之抗議在貴報披露將極端感荷。

前駐美大使 胡適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紐約

關於此事，《胡適日記全集》與《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均無所記。但這是代表當時臺灣唯一的大學內高級知識份子之心聲，對於翌年達成雙邊和約之簽定應有相當的作用。

(叁) 胡適為協助臺灣大學改善專任教員（包括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待遇，特別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洽商。1951年8月27日有致錢思亮校長一函，見「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144期（1951年11月26日）第一版：

思亮兄：

上次中基會執行委員會席上，提出救濟臺大教授的問題，蔣廷黻兄與Mr. Brodie尤熱心，最後決定交我去同你與蔣夢麟兄（中基會董事長）商量出一個具體辦法來。提交九月廿九日的中基會董事年會決定。

我為此事，想了許多時，暫擬一個中基會「國內研究補助費」（Research Grants）辦法，寄給孟鄰先生和你，千萬請你見信後就去看他，早點商量出一個可行的辦法，早日寄下，此事有個大致決定後，似須與臺大各學院院長商量討論，以求圓滿妥善。

我深知道此種事最能使校長院長感覺頭疼，但我們本意實是要幫臺大的一點忙，同時也許可以有點提倡研究的效果，千萬請你同孟鄰先生質直的修正我的草案。

「委員會」正式成立時，須有三人或五人在臺灣。但此時討論原則，擬具提案，似可由你們兩位商量決定，不必拘泥三人或五人的數。（原議是由你們兩位加我共三人擬具辦法提案。）

此事在我手裏擔擱了兩個月，現在才草成一個稿子提供你們作討論的底子。

請隨時寫信給我。

適之 八月廿七

該期「校刊」的後三版為有關此案之英文來往信件，包括胡先生所擬的十項辦法草案。經過兩個多月商討，臺灣大學於11月20日公佈了「專任教員研究補助費申請辦法」，供教員以研究計畫提出申請。共有四十個名額，每個名額300美元，以謀求改善部分教員的收入，維繫學術研究不輟，可謂用心良苦。這一辦法幾年後演變成「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以及往後「國家科學委員會」發展科學的政策之一，對於1990年代以前的學術研究發展之進步，極有助益。惜亦不見於《胡適日記全集》或《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而鮮有人知。

（作者单位：台灣大學化學系）

胡适的圣经收藏

邹新明

笔者在整理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胡适藏书时，发现其中各种版本的圣经有数十种之多，如果说《水经注》是胡适藏书中版本最多的收藏，那么，第二的位置的则非圣经莫属。

对于自己的圣经收藏，胡适在《口述自传》中有一段不无得意的回忆：当年在“‘中国圣经学会’为庆祝该会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中文圣经版本展览’中，我的收藏，竟然高居第二位，——仅略少于该会本身的收藏。这个位居第二的圣经收藏，居然是属于我这个未经上帝感化的异端胡适之！”^①

胡适是否确实“未经上帝感化”，论者有不同的看法。据胡适的留学日记和当时给友人书信，1911年暑期，胡适应邀参加了在亨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举办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与“美国东部基督教学生会”暑期集会。集会有多次名人演讲，或讲解圣经，或讨论儒教。6月18日，一位叫Mercer的演讲，自述如何在信奉基督教后痛改前非，与父亲和好如初，Mercer讲得声情并茂，非常感人。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余为堕泪。听众亦皆堕泪。会终有七人起立自愿为耶稣信徒，其一人即我也。”^②后来胡适在6月21日写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并且说“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③此后，胡适在6月27日，7月1日、2日、9日、29日，9月24日的日记都有阅读《马太福音》的记载。当年10月29日是星期天，胡适去听康福教授的圣经课程，第二年又多次去听此课。因此有论者认为，“自1911年6月至1912年12月期间，胡适为耶稣信徒的时间大约有一年半”^④，可备一说。不过胡适后来对此一直否认，1919年10月，胡适翻阅日记，在所录1911年6月21日致好友许怡荪的那封信后“追记”：“此书所云‘遂为耶氏之徒’一层，后竟不成事实。然此书所记他们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实是真情。后来我细想此事，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⑤胡适是否信过基督教，非本文重点，暂讨论至此。

虽然胡适是否有过短暂的信奉耶稣经历仍有疑问，可以肯定的是胡适收藏各种版本的圣经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宗教信仰。从胡适的日记、书信、传记等资料看，

^① 《胡适口述自传》，收入《胡适文集》第一卷，第2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卷，第10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③ 《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卷，第10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 耿程鹏：胡适留美期间的基督教思想，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00页。

^⑤ 《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卷，第11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适收藏圣经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修养励志，一是学术研究，这其中又以后者为主。

撇开胡适留学期间 1911 年-1912 年的经历不算，胡适阅读圣经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思想启迪。他在《口述自传》中肯定自己当年与基督教界人士接触的积极意义，并强调，“特别是康福教授对我的教导，使我更能深入的了解和爱好圣经的真义。我读遍圣经，对新约中的《四福音书》中至少有三篇我甚为欣赏；我也欢喜《师徒行传》和圣保罗一部分的书信。我一直欣赏圣经里所启发的知识。”^①

胡适不仅自己喜欢读《四福音书》，经常阅读，还推荐给别人阅读，并给予非常高的评价。1962 年 1 月 29 日，胡适在送给汪克夫的一本圣经的扉页上题写了下面一段话：

这本白话的《新旧约全书》是王亮畴夫人送我阅读的。因我已有了这个本子，所以我把这一本转送给汪克夫君。《旧约》是犹太民族的宝典，《新约》是基督教徒的圣书。克夫是基督徒，我盼望他能读《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第四福音是后来才出现的)。我盼望他至少能细读耶稣“山上教训”(《马太》第五、六、七章)：那是世间最可宝贵的文字。

胡适 一九六二、一、廿九^②

1936 年 1 月 9 日，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忆及当年读《圣经·马太福音》中一句话的感触：“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稣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③胡适说，正是这句话激励自己三年多来每周一晚上熬夜编辑《独立评论》。胡适对这句话非常推崇，曾多次在文章和书信中引用，包括 1919 年 8 月 1 日的《尝试集》自序，1926 年 5 月 24 日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35 年 9 月 3 日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57 年复陈之藩函。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资料了解，胡适经常翻阅圣经。如 1937 年 12 月，胡适在纽约宣传抗战，争取美国支持之余，突然想读圣经，就自己买了一本。^④再如，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曾借阅史语所傅斯年藏书中的英文圣经^⑤。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胡适对圣经的重视和对其中一些思想的阐发，而圣经对胡适的影响也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胡适对圣经中某些思想的重视却不是胡适收集圣经的主要动因。胡适对于自己收藏圣经的目的曾有明确的说明。他在《口

^① 《胡适口述自传》，收入《胡适文集》第一卷，第 204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②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 294 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年。

^③ 《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卷，第 586 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

^④ 见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之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上有胡适题记：“民国廿六年十二月，我在纽约，想翻读《新约》，买了一部《旧约全书》。”

^⑤ 见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之“胡适向史语所图书室借阅的借书券”。

述自传》中说：“后些年在北京大学时，我开始收集用各种方言所翻译的《新约》或《新旧约全书》的各种版本的中文圣经。我收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方言。有许多种中国方言，向来都没有见诸文字，或印刷出版，或作任何文学的媒介或传播工具。可是基督教会为着传教，却第一次利用这些方言来翻译福音，后来甚至全译《新约》和一部分的《旧约》。”胡适接着说：“我为着研究语言而收藏的圣经，竟然日积月累，快速增加。”^①此处胡适说得很清楚，收藏圣经是为了研究语言，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各地的方言。

胡适藏书中圣经版本的丰富多样，是他多年留心收集，日积月累的结果。翻检相关资料，其中有两次比较集中的收藏。

一次是1922年5月前后，胡适收到上海寄来的各种版本圣经一箱。他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说：“打开上海寄来的‘圣书’一箱，计五十八册。内中方言的种类之多，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稍暇当为作一详表，先分区域，然后研究。这些‘方言的圣书’将来一定要成为中国语言学、文学、文法学上一组重要的材料。”我们知道，清末不少教会团体都在上海设有出版机构，如伦敦会的墨海书馆，长老会的美华书馆等，而1887年设立的广学会，则为中国基督教最大的出版机构。上海在教会出版机构上的优势，使其成为胡适收集圣经的重点地区。至于胡适此次收集的一些具体情况，目前不得其详，笔者推测，有可能是胡适请上海的朋友代为收集并寄到北京的。

胡适的另一次集中收集圣经是在抗战期间卸任驻美大使之后，于1944年底收购Robert Lilley旧藏，其中包括约60册中、日文圣经。此事经过笔者另有《胡适收购Robert Lilley旧藏始末》一文，在此略述大致经过。

据胡适日记，1944年12月9日，胡适与裘开明、杨联陞同到Robert Lilley的侄子John L. Rhodes家，查看这批藏书。这些书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其中有一类即为“中国、日本的《新约》、《旧约》译本旧版”。胡适答应出五百美元购买。^②经过协商和准备，12月21日，胡适与杨联陞再次到Grafton的John L. Rhodes家，挑选整理装成五木箱，一些零散的小部头书则由两人用手提箱乘火车带回。^③

胡适后来想起当时没有挑走很多种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旧圣经，有意购买，于1945年4月16日致信John L. Rhodes，后者也回信表示许可，但不知何因，似乎此事没能如愿。^④

^① 《胡适口述自传》，收入《胡适文集》第一卷，第204-2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卷，第56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③ 《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卷，第57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 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胡适致John L. Rhodes函”（1945年4月16日）馆藏号HS-JDSHSE-0108-031；“John L. Rhodes致胡适函”（1945年5月16日）馆藏号HS-JDSHSE-0326-011

胡适后来在 1945 年 11 月 3 日回复大英圣书公会秘书，曾在中国传教的 John R. Temple 的信中，明确提到当时从 Robert Lilley 的这批旧藏中收集到中、日文圣经约 60 册。^①

结合胡适往来书信、相关文章、藏书题记，以及 Robert Lilley 本人的签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 Robert Lilley 的身世：Robert Lilley，中文名累莲裳，1839 年 8 月 24 日生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曾在苏格兰教书数年。1867 年到中国，大约一直到 1872 年或更晚，主要在山东芝罘（chefoo, 今山东省烟台市）传教，曾游历满洲等地，1875 年到日本，1881 年到美国，后定居纽约，主要从事编辑工作，编辑多部百科全书、艺术图书。1914 年去世。

除了上述两次集中的收藏，还有一部份圣经出自胡适的朋友和一些机构的赠送，这或许是由于胡适收藏圣经已经有了一定的名声的缘故。

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这批圣经收藏包括中文版 17 种，英文版 10 种，日文版 13 种，总计 40 种。应该说，从胡适两次集中收集圣经的情况看，胡适的各种版本的圣经收藏应该远不止此数。尤其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现存的这些圣经版本中，竟然没有胡适自己津津乐道的各种中文方言版本。从胡适一生著述看，似乎很少涉及中文方言的研究。我们知道，胡适虽然研究兴趣广泛，但由于他在当时学界和思想界的重要地位，各种应酬繁多，加之对政治的讨论和介入，以及最后的近二十年的时间主要耗费在《水经注》的考证上，使他的很多学术计划都未能如愿完成。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只完成了上卷，胡适后半生虽然一直对两书下卷的续写耿耿于怀，多次反思，但却最终未能完成这个心愿。由此笔者推测，由于类似的原因，胡适对于圣经中文方言版本的研究只有计划，而并未实施，但是他对这些版本在“中国语言学、文学、文法学”研究上的意义非常重视，既然自己没有时间顾及，于是极有可能将这些圣经赠送给有能力做这方面研究的某位学者，或者捐赠给了某个相关机构的图书馆。

以下简单介绍一下现存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中各种圣经版本的情况。

一. 中文版本：

《新旧约全书》，共四种：

1. 新旧约全书，上海大英圣书公会，出版年不详，精装 1 册。
2. 新旧约全书 上海美华圣经会，出版年不详，精装 1 册。封面印有烫金字：胡适之先生惠存，美华圣经会敬赠。
3. 新旧约全书 上海美国圣经会，1926 年，精装 1 册。
4. 新旧约全书 上海大美国圣经会，出版年不详，精装 1 册。

^① 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胡适致 John R. Temple 函”（1945 年 11 月 3 日）馆藏号 HS-JDSHSE-0356-003

按：第一种为上海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出版，其余三种为上海美国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一译大美国圣经会、美华圣经会）出版。

《新约全书》，共七种：

1. 新约全书一卷，线装铅印本，清咸丰四年（1854年）香港英华书院。书衣有胡适题记：Gift from The Orientalia, Inc., New York City, April 30, 1941. Hu Shih.
2. 新约全书三卷，线装刻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版者不详。内封有胡适题记：我三年前在美国从 Robert Lilley 的家里收买来的。胡适。一九四八年一月追记。目录及卷端钤有胡适印章。
3. 新约全书，线装，上海大美国圣经会，1920年。题名页钤有“胡适之印”朱文方印。
4. 新约全书，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详，精装1册。
5. 新约全书，王宣忱译，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年不详，平装1册。书脊有胡适题签：新约，王宣忱译。
6. 吕译新约初稿，吕振中译，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46年，平装1册。封面有赠书者题记：胡适之先生指正，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赠。
7. 新约全书 中西字，Shanghai: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大英圣书公会），1922年，精装1册。封面印有赠书者题记：适之老哥欧行，一九二六夏，廷芳敬赠。

按：赠书者“廷芳”即刘廷芳，曾任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即大英圣书公会。

《旧约全书》，一种：

旧约全书一卷，线装铅印本，清咸丰九年（1859）上海墨海书馆。卷端有胡适钢笔题记：一八五九年，上海墨海书馆印，Robert Lilley 旧藏，胡适，一九四五，七，七。

节译本，共五种：

1. 智慧书，北平方济堂圣经学会编译，北平：方济堂，1947年，平装1册。书内夹有“圣经学会”名片一张，上书：适之先生教正，圣经学会谨赠。
2. 玛窦传的福音，萧舜华译，天津崇德堂，1939年，平装1册。
3. 玛尔谷传的福音，萧舜华译，天津崇德堂，1939年，平装1册。
4. 若望传的福音，萧舜华译，天津崇德堂，1940年，平装1册。
5. 路加传的福音，萧舜华译，天津崇德堂，1940年，平装1册。

二. 英文版本:

《新旧约全书》，共六种：

1.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出版年不详, 精装 1 册。扉页有胡适题记: 民国廿六年十二月, 我在纽约, 想翻读《新约》, 买了一部《旧新约全书》。后来我的朋友 Edwin C. Loberstine 在我的房里看见这本子, 他去买了一部 “The Bible Designed to be Read as Literature” 来送我。这两本各有长处, 应该对照着看。廿七年二月, 胡适。封内贴有 “胡适的书” 藏书票。按: 胡适在题记中提到的朋友 Edwin C. Loberstine 赠送的 The Bible Designed to be Read as Literature 一书, 在现存胡适藏书中没有发现。
2. The Modern Reader's Bible, edited by Richard G. Moult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0, 精装 1 册。扉页有赠书者题记: To my good friend Hu Shih, from (此处有赠书者签名, 不易辨识)。扉页另有胡适题记: 李观森先生寄赠的, 胡适, 一九卅二, 十二, 廿七。
3. The Modern Reader's Bible, edited by Richard G. Moult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0, 精装 1 册。封内贴有 “胡适的书” 藏书票。
4.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London: The British & Foreign Society, 1945, 精装 1 册。
5. The Complete Bible: An American Translation, edited by J. M. Powis Smith, Edgar J. Goodspe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精装 1 册。
6. The Hol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New York: Thomas Nelson & Sons, 出版年不详, 精装 1 册。题名页钤有 “适盒藏书” 朱文圆印。扉页有胡适题记: “For his word was with power.” —Luke IV. 32. 《新旧约全书》, 胡适。

《新约全书》，共四种：

1. The New Testament in Basic English,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41, 精装 1 册。
2. The Goodspeed Parallel New Testament, edited by Edgar J. Goodspeed,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3, 精装 1 册。扉页有赠书者题记: For one of the world's good gentlemen, Dr. Hu-Shih, from (此处有两位赠书者签名, 不可辨识) Chicago, April 5, 1944.
3. The New Testament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Paterson: St. Anthony Guild Press, 1941, 精装 1 册。书名页前页有田耕莘签名: +

Thomas Tien S. V. D., Cardinal Archbishop of Peiping.另有胡适题记：民国卅六年四月廿九日田耕莘枢机大主教来访，我请他题名在这本书上。封内贴有“胡适的书”藏书票，上有胡适题记：此是天主教新修改的“新约”，1941年印行的。

4. The New Covenant Commonly Called The New Testament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New York: Thomas Nelson & Sons, 1946, 精装1册。扉页有胡适钢笔题记：Hu Shih, 胡适, May 16, 1946, New York.

三. 日文版本：

《新约全书》，共四种。

1. 新约全书，横滨：北英国圣书会社，1880，精装1册。
2. 引照新约全书，横滨：北英国圣书会社，1880，精装1册。
3. 新约全书，横滨：北英国圣书会社，1883，精装1册。
4. The New Testament in Japanese, by J. C. Hepburn, Yokohama: Seishi-Bun-Sha, 1886, 精装1册。

按：此书为日文罗马拼音译本。

节译注解本，共9种：

1. 点训马可讲义，横滨：伦敦圣教书类会社，1882，精装1册。
2. 训点旧约圣书创世纪，横滨：北英国圣书会社，1881，平装2册。
3. 训点旧约圣书出埃及记，横滨：北英国圣书会社，1882，平装2册
4. 训点旧约圣书民数纪略，横滨：北英国圣书会社，1882，平装2册。
5. 旧约圣书塞缪尔后书，横滨：北英国圣书会社，1883，平装1册。
6. 路加传福音书批注，神户：米国遣传教使事务局，1878，平装1册。
7. 训点旧约圣书利未记，横滨：北英国圣书会社，1883，平装1册。
8. 旧约圣书创世纪，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详，平装1册。封面有原书主签名：R. Lilley。
9. 训点旧约圣书申命记，横滨：北英国圣书会社，1883，平装1册。

从书中的题记看，40种圣经中属于朋友或机构赠送的有7种。13种日文版本圣经只有一册有 Robert Lilley 的签名，但笔者根据这些版本的情况推测，所有这些日文版本应该都是他的旧藏，此外，中文版本中有两种也是他的旧藏，这样，在现存胡适的圣经收藏中，大致至少有15种属于 Robert Lilley 旧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校史馆）

胡适收购 Robert Lilley 旧藏始末

邹新明

在整理胡适藏书的过程中，一些有“R. Lilley”签名的图书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这些图书中不少是关于中国、日本文化、典籍的，也有不少中、日文版的圣经。这个“R. Lilley”是何许人，他的藏书为何有许多中日文图书，这些藏书又是如何归入胡适收藏的呢？随着胡适藏书整理的推进，加之对胡适日记等相关资料的深入翻检阅读，以及借助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的丰富资料和便捷检索，这些萦绕在笔者心头数年的谜团终于慢慢解开。

R. Lilley 的这批藏书有一个特征，就是比较破旧，不少图书或封面、封底脱落，或中间散开，或有缺页。笔者在整理胡适藏书过程中偶然发现仅存扉页前后数页的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扉页上有胡适如下题记：“我访求此书多年了。去年十二月买得传教士 Lilley 遗书五箱，其中有此书，我十分高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八日，胡适。”从中可以了解到，胡适的这批 R. Lilley 的旧藏是 1944 年 12 月购买的，R. Lilley 是位传教士。

翻检胡适日记，关于购买此书的前后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交待。

其 1944 年 12 月 9 日说：

有一位老传教士，Robert Lilley，五十年前在中国、日本带了一些书回来；他死后，其书归其侄 John L. Rhodes (of Darling & Rhodes Co., 32 Ansten St., Worcester, Mass.)，他很想把这些书卖去，但无人要。

我今天与裘开明、杨联升同去 16 South St., Grafton，到 Rhodes 家中去看这些书。

书凡有五类：

1. 明治十三年 (1880) 弘教疏远的缩刷藏经四十帙，没人用过，还是全新的。

2. 日本旧刻各种零种佛经。

3. 中国、日本的《新约》、《旧约》译本旧版。

4. 英、美治中国学者 (Etkins、Giles、Williams) 诸人的著译 (如初版 Giles 字典之类)。

5. 中国旧书，但甚多佳版。

我许以五百元买此批书。Rhodes 深满意。但最困难的是如何装运此一大堆书。

上引日记告诉我们，R. Lilley 全名 Robert Lilley，是个传教士。

1944年12月21日则记录了运书的经过：

今天与杨联陞下乡到 Grafton 的 Mr. John L. Rhodes 家中，费了六点多钟，把 Robert Lilley 的遗书整理出来，装成五木箱，即托 Rhodes 交转运公司送到我的纽约旧寓暂存。有一些小部书，我们两人用手提箱带归。

半夜从 Boston 上车去纽约过节假。

杨君在火车上作小诗：

才开寿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庐。

积习先生除未尽，殷勤异域访遗书。

1944年12月29日记下这批书运到：

Grafton 寄来的五箱书，今天运到了。

如果说胡适日记中的上述记载已经勾勒出了购买 Robert Lilley 旧藏的大致经过，那么，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的相关书信则对于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一些具体细节起到很好的补充说明。

胡适是如何知道这批 Robert Lilley 旧藏的呢？

在“胡适档案资料库”中，笔者查到 Robert Lilley 的侄子 John L. Rhodes 1944年12月11日给时任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的裘开明的信，信末说：I realize that you have put in a great deal of time and thought to bring this sale, and I appreciate it.（大意是说，我意识到在此次藏书交易中你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非常感谢。）^①由此笔者推想，胡适购买这批图书应该是由裘开明牵线的。

从胡适日记看，似乎五箱书运到之后，此事即告结束。然而笔者从“胡适档案资料库”中发现胡适1945年4月16日写给 John L. Rhodes 的信，信中说：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his many kinds of old bibles, Greek, Latin, Hebrew, and possibly other languages. If you have not thrown them away as junk, I would like to buy them.

（大意是说，我在考虑他的很多种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旧圣经，如果你还没有把它们当作破烂扔掉，我很愿意收购它们。）^②这表明胡适当时与杨联陞“整理”这些旧藏的时候，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经过挑选的，胡适后来又准备购买当时没有选走的一些旧圣经。同年5月16日，John L. Rhodes 给胡适回信，说只要胡适愿意随时可以去挑那些圣经。^③现存的胡适往来书信中，此后再未发现二人的书信往还，而且现存的胡适藏书中，也没有发现这些语种的旧圣经，或许此事由于某些原因并未最终落实。

^① 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John L. Rhodes致A. Kaiming Chiu函”（1944年12月11日）馆藏号HS-JDSHSE-0483-023

^② 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胡适致John L. Rhodes函”（1945年4月16日）馆藏号HS-JDSHSE-0108-031

^③ 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John L. Rhodes致胡适函”（1945年5月16日）馆藏号HS-JDSHSE-0326-011

我们知道，胡适藏书中，有不少各种版本的圣经，前引胡适日记中也提到，Robert Lilley这些藏书中有一类是“中国、日本的《新约》、《旧约》译本旧版”。“胡适档案资料库”中胡适 1945 年 11 月 3 日回复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秘书，曾在中国传教的John R. Temple的英文信函中说：Only last year I acquire about 60 volumes of Early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for the library of an old Scottish missionary, Robert Lilley.（大意是说，就在去年，我从一位老苏格兰传教士Robert Lilley的藏书中获得了大约 60 册中国和日本早期圣经译本。）^①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胡适当时购买中日文版本圣经的数量。

笔者对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胡适藏书进行了大致调查，发现其中、日文圣经收藏中，明确属于 Robert Lilley 旧藏的有中文线装书两种，日文书一种。中文线装书其一为 1859 年上海墨海书馆印行的《旧约全书》；其二为 1872 年印行的《新约全书》，东交民巷耶稣堂藏板，该书封面有胡适题记：“这是官话译本的初版，甚可宝贵。我三年前在美国从 Robert Lilley 的家里收买来的。胡适，一九四八年一月追记。”日文圣经为《旧约圣书创世纪》。此外，胡适藏书中尚有日文圣经 12 种，从年代品相看，似亦为 Robert Lilley 旧藏。这样胡适现存的 Robert Lilley 旧藏中，大致有 15 种中日文圣经。即使如此，与前述胡适在致 John R. Temple 书信中所说的 60 册相差甚远。笔者另有《胡适的圣经收藏》一文，曾对于为何胡适现存圣经种数远远少于见于各种记载的数量提出自己的推断，认为胡适有可能将一些不同中文方言译本的圣经赠送给某研究者或研究机关。

胡适现存 Robert Lilley 旧藏中、日文圣经远远少于当日购买之数，胡适所购五大箱 Robert Lilley 旧藏在现存胡适藏书中的状况也大致类似。据笔者搜检统计，胡适藏书中 Robert Lilley 签名、胡适题记等确凿证据属于 Robert Lilley 旧藏，洋装书共计 38 种，主要内容为中国、日本经典和文化；线装书四种，两种圣经，其他两种分别为《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格物探原》；日文书一种，即上面所说的《旧约圣书创世纪》。也就是说，明确属于 Robert Lilley 旧藏者共计 43 种，即使加上笔者推测属于 Robert Lilley 旧藏的日文圣经 12 种，也只有 55 种。当然，胡适藏书中没有确切属于 Robert Lilley 旧藏线索的图书应该还有一定的数量，但即使如此，笔者推测，现存胡适藏书中的 Robert Lilley 旧藏可能远远够不上最初购买的五大箱。

1945 年 7 月 13 日，胡适作《记但明伦道光壬寅（1842）刻的〈聊斋志异新评〉》，介绍了他购自Robert Lilley旧藏中的《聊斋志异新评》，文末的一段话引起

^① 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胡适致John R. Temple函”（1945年11月3日）馆藏号 HS-JDSHSE-0356-003

了笔者的注意：“今天决定将此本送人，故摘记此本中可记者于此。”^① 这表明，胡适并未将这五大箱图书全部运回国内，有的直接在美国送给了他人，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胡适现存Robert Lilley旧藏没有当年购买时那么多。

关于Robert Lilley，胡适日记中只说他是一个老传教士，到了他写《记但明伦道光壬寅（1842）刻的〈聊斋志异新评〉》一文时，不仅指出Robert Lilley的中文名字为累莲裳，而且说“累君在中国八年（一八六七—一八七五），他买此书当在七十多年前，……”^②指出了Robert Lilley在中国的确切年代，还纠正了他在日记中关于Robert Lilley“五十年前在中国、日本带了一些书回来”的说法，由此也可推知，Robert Lilley的侄子John L. Rhodes对他的生平也不甚了解。Robert Lilley中文名字累莲裳，在胡适所写的藏书题记中也有提及，当有所据。而胡适关于Robert Lilley在中国具体年代等信息则得自于A. M. Hummel，也就是早年曾到中国传教的著名汉学家恒慕义。1945年1月3日，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的恒慕义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告诉胡适，在《1908-09年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 for 1908-09*）中，查到了Robert Lilley，并将该词条用打字机打出，附在信后。^③从恒慕义的这封书信我们可以推断，大约在购买了Robert Lilley旧藏之后不久，胡适写信给恒慕义，请其代为查找关于Robert Lilley的资料。

结合恒慕义书信所附词条内容、胡适的有关说明以及Robert Lilley自己在藏书中的题记，我们对于Robert Lilley的生平有了大致的了解：

Robert Lilley 1839年8月24日生于苏格兰的格里诺克，曾在苏格兰教书数年。1867年到中国，大约一直到1872年或更晚，主要在山东芝罘（chefoo，今山东省烟台市）传教，曾游历满洲等地，1875年到日本，1881年到美国，后定居纽约，主要从事编辑工作，编辑多部百科全书、艺术图书。1914年去世。

Robert Lilley的藏书有的是他从苏格兰带出的，有的是在中国自欧美购买的，有的购自中国、日本，然后被他从日本带回了美国，最后又被胡适买下，再度飘洋过海，有些书“落叶归根”，有的书则是再度“背井离乡”。在文献日益数字化的今天，这种藏书流散播迁的故事也必然也越来越少了。抚摸这些昔日贤哲曾把玩研读的旧物，遥想当年这些藏书远涉重洋、聚散分合的种种经过，不免令人感慨系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校史馆）

^① 《胡适文集》第10卷，第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胡适文集》第10卷，第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Robert”误作“Rolect”。

^③ 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A. M. Hummel致胡适函”（1945年1月3日）馆藏号HS-JDSHSE-0237-030

胡适在韩国的九十年

金瑞恩

内容提要：

从1920年代开始，韩国知识界传播界即开始关注胡适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运动。在此之后的90年时间里，韩国先后翻译了胡适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作品和文学作品，更是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胡适在文学、历史、哲学、社会言论思想等领域内的主要思想，其中除了一般性的报刊文章，还有越来越占据韩国的胡适研究重要地位的学位论文。这些研究，一方面表达出韩国对于胡适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思想与文化现代化运动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将上述信息传播到了韩国，从而也构成了韩国与现代中国关系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为了韩国自身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

关键词：胡适、韩国、现代化运动、90年

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大人物”，习惯上都会被贴上一些与之相关的标签。一般而言，这些标签大都是符合实际的，不过也会有一些未必与之完全贴切相称。例如，唐朝诗人李白和杜甫分别被誉为“诗仙”和“诗圣”，鲁迅由于写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品，被尊誉为“中国现代第一作家”。这些“标签”，都是贴切的。而本文所要涉及到的胡适，尽管也有“白话文的开倡者”、“新文化的倡导者”等“标签”，但我个人觉得，要找到一个与跟胡适这一人物最合适的“标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胡适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一个领域，而是在文化、文学、政治、历史、思想、教育等范围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胡适（1891—1962），中国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的倡导者之一，又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据不完全统计资料，中国有关胡适的文章和作品总共有15万部/篇以上^①，其内容也涉及了胡适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社会思想言论的贡献等各个方面。曾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大陆对胡适研究的主要成果，可分为三个时期——新时期之初的胡适研究、1980—1990年的胡适研究和世纪之交的胡适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一个阶段的研究范围局限在五四时期与新文化运动，第二个时期开始扩展到胡适生涯与日记、胡适的文学活动（包括胡适小说考证与评价）、胡适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研究、胡适的文化观——改良主义、

^①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北京。

神宗文化史观、胡适文艺美学思想与文学创造研究等的方面。进入90年代，研究胡适的范围更仔细起来——开始研究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文学翻译和戏剧改革研究、还有胡适文学思潮等的内容。^①

在韩国，最早上个世纪50年代在首尔大学和成均馆大学设置了中文系，70年代开始建设有关中国文学的学科。但是当时由于中国和韩国互不来往，韩国无法得到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研究资料，所以1970年代以前韩国对中文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语言和古代文学。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韩国学者才有机会进行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根据上述情况，在韩国研究胡适的成果当然比不上中国——其实以“微不足道”来形容更贴切。而且研究的内容、数量、范围也有局限性。按照“RISS”（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的韩国教育学术信息员提供的学术研究信息服务），直到现在韩国有关胡适的硕士/博士论文仅有18篇，韩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胡适论文有44篇。^②其内容的主题主要涉及到胡适的文学、政治思想、哲学等方面。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被传播、介绍到周边各个国家，尤其不能忽视以胡适为中心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学对韩国的重大影响。韩国的“近代开化期”以后的文学，通常说受到日本化的西欧文学的影响，但同时还受到中国化的西欧文学的影响。韩国最早于1920年介绍胡适，迄今已有90年。胡适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三年后，1920年韩国的杂志《开辟》^③上，连续四期，刊登了梁白华^④以《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的题目下使用当时的资料来介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要旨和运动的进行结果等。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梁白华的创作，而是翻译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支那学》上发表的文章。另从1922年8月22号到9月4号，连续十三日，梁白华在韩国的《东亚日报》^⑤上以《中国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题目，再次介绍中国的文学革命。在这篇文章里，梁白华尽管抄录了不少胡适理论，但同时也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说明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1923年，李允宰^⑥在《东明》^⑦杂志上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为题

^① 《鲁迅与胡适文化思想研究》，郭运恒，线装书局，2007年5月，北京。

^② 这里所说的是在韩国国内发表或完成的论文，但不包括韩国学者在国外发表的有关胡适论文。

^③ 韩国近代著名的杂志。1920年6月25日创刊，1926年8月1号第72期开始被强制停刊。他的名称来自于天主教的“后天开辟思想”。主要编辑是参与当时阶级主义的新倾向派作家。包括韩国的知名作家——玄镇健、廉想涉、李箕永（小说家）、赵明熙（小说、戏剧家）、李相和（诗人）等人。

^④ 梁建植，1889-，出生在首尔，中国文学研究者，主要研究及介绍中国戏曲、小说、古诗、随笔、批评等。

^⑤ 1920年4月1号创刊的《东亚日报》，是韩国近代日帝强占期坚固民族代表报纸。提倡“和平主义”与“人本主义”，刊登了许多论文、文学理论以及评论，对韩国近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⑥ 李允宰，1888~1943，庆尚南道金海市出生，韩国语研究者，朝鲜语学会成员，他的一生为了韩国、国语工作，1993年指定发表“韩文正字法”，1936年基础首尔话来完成“朝鲜语标准语统一案”，1943年在监狱里不能忍受日本的严刑拷打而绝世。

^⑦ 1922年9月3号创刊的《东明》，于1923年6月3号停刊。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周刊，最初以“一致民族自助”的口号来创立杂志。比较深层的解释时事问题。1923年改名为“时代日报”。

目翻译介绍胡适的思想。这也是韩国最早翻译介绍的胡适理论著作之一。此外，同年《东明》上还翻译介绍了胡适的新诗《上山》和《我的儿子》，李允宰亦另翻译《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等诗。^①

1929年6月吴天锡^②的《胡适氏的东西洋文明批判》刊登于《新生》^③第6期10号。1931年《东亚日报》的中国特派员申彦俊在《东光》^④8月号《现代中国思想家列传》中介绍了“实验主义者胡适”。

1925年1月1日，胡适本人在《朝鲜日报》^⑤刊登了《当代中国思想界》一文，并附有“敬祝新朝鲜的进步”的祝福语句。这篇文章是从东西文明观差异展开的“人生观论争”（科学与玄学论争）。同年同月同日《东亚日报》里亦有一则有关胡适可能来访韩国的报道。据报道说胡适认为自己不通韩语，不了解韩国的情况，所以没有写论文的计划，但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己想看的历史文献资料。在这则报道旁边还附有胡适专门为《东亚日报》题写的“敬祝：朝鲜的将来与年俱新。《东亚日报》新年号嘱书。胡适 一九二五年。”^⑥查《胡适日记》，1925年1月的日记，是从1月17日开始记的，并没有出现胡适接受《东亚日报》采访并题写新年祝词的记载。

在韩国，胡适著述的韩文翻译虽然数量不多，但还是有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除了上面提到所翻译的那些作品外，1963年闵头基把胡适著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翻译成韩文出版。其后1972年和1973年又分别翻译出版了《胡适文选》、《四十自述：胡适自传》，2007年胡适的《终生大事》与陈大悲、丁西林、田汉、欧阳予倩等的戏剧一起被翻译成韩文，并以《中国现代独幕剧选》书名出版。2010年胡适的《尝试集》也在韩国出版。

在胡适的著作研究方面，被称为“研究胡适的必读书”的闵头基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实验——胡适的思想与活动》在1996年出版。这本书分三部分“新思想的旗手”“为了中国文明的再创造。”“孤独自由主义者的路径”。书中主要考察胡适的自由主义——胡适的自由主义实验在他的一生是怎么展开来的。这种考察既是对胡适“失败”过程的一种考察，同时也是对中国现当代发展过程的考察。2000年洪昔杓出版了《中国近代的文学意义形成研究——以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和

^① 《胡适的文学革命影响与其受容面貌》，李錫浩，中国文学研究，1974年。

^② 吴天锡，1920. 11. 12-1987. 10. 31，出生于首尔，教育学者，1925年入康奈尔大学学教育学，1931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一生贡献与韩国的教育学领域。

^③ 1928年10月1号创刊，1934年1月1日停刊。发行人为传教士J.F.Genso(韩文名字：金炤)，主要登载有关宗教、历史、哲学、文化的文章以及内容为启蒙精神的文学作品。

^④ 《新生》1926年5月20日创刊，1933年1月13号停刊的综合性月刊。代替民族主义的立场提倡民族的主体性与民族思想。1933年6月改称《东光丛书》，1954年又改为《凌晨》。

^⑤ 《东光》，1920年1月16日创刊的综合性日报。

^⑥ (韩) 闵头基，《中国的自由主义实验——胡适的思想与活动》，知识产业会，1996年。

鲁迅的小说创作为中心》。这本书是作者1996年的博士论文。2006年学者李廷吉的《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与实践》出版，这也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

总体而言，韩国学术界全面开展对胡适的学术研究比较晚。最早1969年，首尔大学大学院中国语文学科李峻以《胡适研究》题目发表硕士论文。因刚刚开始研究胡适，其内容很简单——介绍胡适的生涯和他的文学思想、理论等方面。例如，其中提到了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来开始新文化运动，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发生的过程与它的影响，胡适的新诗有什么样的意义等内容。以后在韩国，70年代发表了3篇文章，80年代发表了9篇，90年代发表18篇，进入21世纪发表了31篇文章。接下来我以1. 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想潮流之研究、2. 胡适白话文学史观之研究、3. 关于中国白话传统之研究、4. 胡适新诗之研究、5. 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之研究、6. 胡适的红学及相关学术思想之研究、7. 胡适的戏剧作品之比较研究七个方面，来具体分析韩国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的一些情况。

1. 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之研究

1.1 关于个人主义

1981年申聖旭发表的《中国五四时期（1915-1919）个人主义思想研究》指出，五四时期代表思想者胡适与陈独秀为了摸索新生民主共和国适合的价值观，提出个人主义思想，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是来自于美国与法国革命后形成的民主共和国政治体制思想里面的“社会契约说”（The Contractual Theory of State）。而且胡适受到“社会进化论”与“价值变动着”的影响，主张中国应建立像美国、法国一样健康的民主主义社会和共和国政治体制。首先是摆脱传统的儒教主义，变化到现代个人主义。文中还介绍了胡适的个人主义思想里面所体现的人的天赋价值及他的思想源泉。第一，胡适主张“自主独立精神”是人的天赋价值。第二，胡适主张“自由精神”是人的天赋价值。第三，胡适认为“平等精神”是人的天赋价值。第四，胡适主张“创造精神”也是人的天赋价值，因此人才可以跟动物区分。因为这篇论文发表较早，所以大部分内容限于介绍胡适的个人主义思想及胡适的主张所发挥的影响。

1.2 关于进化论

对胡适来说，“社会进化论”不只是受用于西欧“近代”核心媒介的概念，还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对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所发表的各种文化论和文学论以及以后的思想变化产生了不断的影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

期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各种思想因素，比如说，“实验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在“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当中诞生的。金尚源的《胡适的历史的文化进化论再探》一文，比较了西方和东亚，尤其是中国进化论的收容过程以及其思想的内容，来解释胡适对中国近代进化论的意义。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也可以说是“社会进化论”的文学变容。因此，为了确切地了解当时他所提出的各种文化理论和他的文学实践，首先非得了解他对西欧“近代”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让他发生了最深影响的“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变容过程。有了这一系列的了解，我们才能确切地知道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显示出的多样思想倾向和各种局限的因素，而且才能知道那就是随着当时中国的实验交给他的时代任务的性质，把“社会进化论”的多样内涵选择地变容的结果。

1.3 关于自由主义

宋黄在其硕士论文《关于当代的问题来反思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以孙文的国家理论与胡适的实验主义为中心》里提问：“中国近代大学者‘胡适’改革开放以后被许多学者作了与1950年代相反的重新评价。这种评价的潮流可以叫‘胡适热’。这‘胡适热’反映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现代的自由主义把胡适视为自由主义的中国近代开始。自由主义来源在于西方近代，这时代里最重要的社会特点是‘资本主义发生’和‘资产阶级登场’。但是在重新评价胡适的潮流中研究者们不谈到这种集体的社会层面的问题。研究者们只拿着抽象性质的‘个人自由’和‘一点一滴的改良’来重新评价胡适和自由主义。”接着，宋黄在认为如果考虑这具体的社会问题论自由主义的近代中国开始，应该谈“孙文”，同时考虑胡适的“好政府论”。通过对他们的仔细分析，便可以知道孙文和胡适的思想同样是自由主义的起源，而且两者的思想都体现对反民主的“贵族主义的整理”。

1.4 关于人权论

延世大学白永瑞教授的《自由主义的革命与胡适》一文指出，“史料”总是有待研究者的新解释。虽然30年代中国现代史上提出的“人权论争”也是现实上被压抑的历史可能性，但把握新的观念可以提供对现实的批判观点。1929年到1930年以国民党的“一党治国”政策，开始了《新月》、《新生命》对人权的论争。权力集中带来的思想控制的争论焦点是训政与人权的关系。胡适曾经在《新月》发表政论说，为了保证人权，应以宪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训政论者以权力来提倡他们的想法，胡适是以社会来提倡他的主张。虽然胡适的人权论存在局限性，但他的人权论里面包含着尊重集体的想法。

1.5 关于伦理观

实用主义者胡适曾经觉得方法论的发展决定哲学的发展,以方法论的历史来编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胡适评价墨家是实验主义(实用主义)的。但他为了实用的极大化,墨家的教理“实践兼爱”不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伦理。胡适以为实用主义是促进科技的生活,但在人际关系里不能介入利益、实用的观点。他虽然接受西方的实用主义,但他只接受跟伦理分开来的方法论。李惠灵的《通过“中国哲学史大纲”来看胡适的伦理观》一文也肯定胡适的这种想法。胡适的伦理观属于儒家的。他解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子、孟子的伦理学是个人主义的,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人生观。这就是跟胡适主张的科技人生观一致的想法。儒家用对天下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来代替科学,用叫“天下”的词汇来代替“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种在西方近代目标论和伦理学里使用的词汇,但胡适主张的科技人生观是跟提倡“爱人”的儒家观点毫无二致。两者里面除了“全体的利益”以外,任何利益、任何实用都不能正当化。

2. 胡适与白话文学史观之研究

金元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对胡适白话文学史观的检讨》一文,探讨白话文学的进化史。文章认为,胡适把文学当成白话文学史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小说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为通俗文学并具有疏通性的特点及其社会价值,也就是说他在文学史叙述方面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观基本上以进化论的收容、个性的解放、科学的视角、平民及历史的再发现为主。

五四新文化运动跟古典文学的差异,在于它在选择以及继承当中寻找历史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晚清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传统思考和文化方面的大规模变革,也在建设新的语言观念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金尚源在《文体改革与新文化运动》里用古代、晚清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比较来归纳出这种问题。他的论文里要注意的部分是“文和白的对立与两种文化价值体制的冲突——语言、文化和文学,语言观、世界观和文化变革,问题改革与文化权力的转让”。因此他认为,五四白话运动是从语言的改革导出文学的改革,再加上从语言和文学的改革导出社会改革和文化变革的企划中开始的。当时胡适为了打破言文不一的语言结构和由此产生的思考的歪曲现象,以及从二元的语言观念中产生的社会

不平等结构，认为应该以白话来代替文言。与此同时，应该把白话的运用提到作为全国共同语的“国语”地位，由此引起文学和文化的全面变化。可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进行的这种文体变化的计划，是与文化权力的转移有关的敏感问题。因此，在支持和反对白话文运动的阵营之间，不但发生了非常尖锐的对立和争论，而且最终并没找到合一点。

2009年李善玉在《中国文学》上发表了《胡适的白话文学论》。其内容涉及白话之发现，围绕白话论的论争与评价，白话与国语运动的结合。通过这种程序考察了从胡适白话、文学论到国语问题的整体内容。文中说：“这篇论文是关于胡适的白话文学论涵盖的多重意义。白话文学论为时代所逼出来的，当时的时代问题是围绕从传统中国转换到近代国家的种种危机意识和策略展开的。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形成经过几个阶段。第一，发现白话；第二，从文字问题到文学问题；第三，形成文学革命论；第四，白话诗的实地试验；第五，文学革命运动；第六，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结合。”李善玉继续解释，白话文学论涵盖国语统一的手段、文学革命、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清楚明白的文学趋向、平民主义的倾向。同时李善玉提出白话文学论的局限性。

3. 关于中国白话传统之研究

李廷吉的《胡适白话文运动的源流》一文，讨论胡适是西洋文化上加入中国传统文化，进步的、进取的爱国主义者。李廷吉的论文中比较有趣的是，按照“揭载志”来分成胡适的生涯。李廷吉在论文中亦指出：“有人说：中国白话运动是西洋文明之影响。但是这样的看法是一种偏见。”当然有些作家受到西洋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进化论之影响，但中国的传统里还存在进化论、个人主义的看法，这篇文章主要观点是找出白话文之传统性。早在晚明，“公安派”主张了中国文学的进化论。胡适也肯定受到“公安派”的影响。因他的《新文学运动小史》里曾提到公安三袁之影响。因此，白话文运动是继承了公安派进化论的。尤其胡适在美国学习西洋文学的时候，发现了中西两国文学上的共同点。为了证明他的主张，调查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胡适和西洋文学模仿者的胡适。而李廷吉通过这篇论文想说胡适的白话运动不但受到西洋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中国的传统进化论的影响。李认为白话文运动的根源位于于中西文化的融合，不能忽视任何一方面的影响。

同样，崔成卿在《中国的新诗革命与公安派的影响》里面更仔细的说明公安派和胡适的关系。崔成卿以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内容重视与诗体解放、俗文学重视的目录来解释自己的观点。

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没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没不为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①

胡适对上述思想的表述：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②

比较两段文字说明，白话文运动的基本原理就是文学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袁宏道与胡适说，文学的进化，即变迁的观念就是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他们通过这种主张来反对拟古和复古的思潮。新文学时期胡适的历史文学观念论，已经早在300年前，明末的袁宏道就已提出过了。

此外，在诗体方面上两个人的主张还是一致的。袁宏道与胡适都提倡“不摹仿古人，语言须有个我在，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等形式上的自由与内容的开放。在诗体革新的方面上胡适比袁宏道更创新。但是这种差异就是程度上和时代上的差异而已，在追求文学的自由性、反对束缚等的根本上的精神是一致的。两个人都重视俗文学的意义。袁宏道重视小说和戏剧的价值，胡适主张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其根源在于民间文学上。他们俩以为俗文学是没有装饰而真实的，以老百姓的语言——白话来创作的同时，带有独创性。但是从这里不容易看出胡适直接受到公安派袁宏道的影响。因为胡适的作品里面没直接提到过与袁宏道的影响关系。只说，读过继承公安派文学理论的袁枚的文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公安派虽然没有直接对胡适起到影响，但是在晚明、清代继承公安派文学理论的袁枚、李渔、金圣叹等的文章来整理了对新文学的自己的想法。如此，崔成卿在自己的文章上指出胡适的新文学思想不但受到西方的思潮，也肯定了中国传统进化论对胡适的影响。

4. 胡适新诗之研究

^① 《与丘长孺书》，见《袁宏道集笺校》，钱伯诚 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上海。

^②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欧洲的文学革命通过一百年的努力才获得了成功，可是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只用三十年构成的。这么短时间内的革命，先驱者的作用非常重要。以其多种贡献来看，胡适可算是真正的开创者。金惠经的《胡适新诗运动考》一文，全面地解释“胡适的新诗”。对胡适新诗的研究，我们一般重视新诗的影响方面，但作者主要探讨了新诗的产生背景，即胡适美国留学期间对新诗产生的作用。胡适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理论的基石在于留学期间跟朋友——梅光迪、陈衡哲、任叔永等的讨论和创造。然后金惠经在这篇论文里指出胡适新诗里包含着的思想内容。例如：乐观主义、经验主义、说理、人道主义等。对胡适的爱情诗也讨论。金惠经认为，胡适的爱情不像徐志摩、郁达夫的诗一样激动、哀怨的美丽。相反胡适的爱情是含蓄的，深入而不激情的。所以《尝试集》的诗有关爱情方面都不太明显，只在他翻译的作品有关爱情的描写较为外露。随后，金惠经继续讨论了胡适诗的缺点和胡适诗的影响。

此外，庆南情报大学崔成卿教授也深入研究了胡适的新诗。这里简单的介绍崔成卿分析胡适新诗的两篇文章——《胡适新诗的空间构造分析》和《胡适诗的抒情性研究》。首先，《胡适新诗的空间构造分析》里说，我们读胡适新诗的时候，诗里面作家创造时，空间构造即诗人的意识构造带着许多样子，以展示诗人的情感。这种手段也是诗人把自己的情感传给读者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要注意胡适新诗作品的文学上的空间，即空间构造——内外对立的空間构造；《一念》，《八月四夜》，《无题》，《蝴蝶》等的作品里面怎么包括着空间构造，上下对立的空間构造；《湖上》，《小诗》，《中秋夜月》，《月诗》等的新诗来分析上下对立的空間构造。胡适有意或无意地创造新诗的时候连续地、等质地构造了空间。这种空间的构造化让读者发生视觉的意象效果和感动的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创造新诗的时候积极地表现自身的内在世界。

在第二篇论文《胡适诗的抒情性研究》里探讨胡适描写的抒情。中国自古代表素有“诗国”之称。古代诗，特别抒情诗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声名显赫。但是通过五四时期，这古老的传统却遭到强烈的挑战。一些新的文本结构原则，新的表意方式构成一个新的艺术传统。这一切都是从胡适开始的。胡适的诗歌里面可以看出多样的抒情性，而在这篇文章里以胡适的新诗《一笑》，《看花》，《老鸦》，《一颗星儿》等来看孤独的抒情性、相互交感的抒情性、自然合一的抒情性。而且考察了胡适作新诗的时候认识的中国传统诗的押韵、平仄使用问题。

崔灵熙在她的硕士论文《胡适的五四时期文学论——以新诗为中心》讨论以新诗为中心的胡适的文学论。崔灵熙解释胡适新诗的具体面貌的时候说：“从胡适新诗的具体面貌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胡适对祖国的未来充满肯定的乐观之心。虽然胡适文学革命开始的时候，社会政治上有困难的情况，可是历史潮流在前进

中国也会有在人的个性上的尊重和走民族之路的乐观。胡适的愿望是祖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为完成牺牲了革命先烈们的心愿，用人道主义的说理诗抒发自己的情感，在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岁月流过，他为没有做到先烈的意原而忏悔。表露出诗人自身对祖国的很强的爱国心和断不了的感情。”

5. 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之研究

禹钟淑的《有关胡适的全盘西化认识研究》一文，以历史专业的观点来谈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主要讨论胡适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对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认识的内容——分为西洋文化认识的方面和传统文化认识的方面。而且批判胡适的全盘西化认识的时候说明，胡适的改良主义与全盘西化论的矛盾性。因为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是在西欧文化的框架上面收容全盘的西化文化。但是他的改良主义主张，现实上自体里尊用改良的方法而改革中国现实。看这方面的时候会知道，胡适并没主张过文化折衷论，但是他的改良方法上面充分地存在折衷的色彩。而且禹钟淑批判五四时期胡适的主张与后期胡适的主张上的不一致，胡适的思想可以发现矛盾性。

鲁长时于2006年在东亚人文学上发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盘西化论”试探》一文主要讨论“全盘西化”的整体内容。如在中国出现全盘西化的背景、中国全盘西化论者们的主张（以胡适为主）、与本体文化派的论争、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立场等等。当时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发达的、主流的。虽然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学习西方的发达文化的认识，但中国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全面的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盘西化”，有一部分是过度的。因为任何民族都有通过民族共同体创造的文化，其文化随着以民族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性来变化了。通过悠久的历史过程形成的文化，可以缓慢的变化，可是像全盘西化的主张一样，短暂、全面的变化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全盘西化论的机械式的观念带着被批评的味道。虽然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在当时受到许多人的批判和指责，但是胡适的全盘西化不是表面的“完全”的全盘西化。他主张“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力的现代化”，“充分的现代化”。这说明胡适的全盘西化不是终极目标，而是行动指南。这种想法的起源在于肯定各个民族的特殊性。研究者鲁长时在论文中以胡适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充分的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等文章来支持自己的想法。

6. 胡适红学及相关学术思想之研究

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变进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过程而发展的。赵美媛教授的《近代红学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分析了近代红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别以考证派红学为中心。在这个过程中，胡适为了整理国故和批判传统文化考证了红楼梦而且开创了考证派红学。赵美媛的另一篇论文《对俞平伯与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批判的考察》则主要介绍了在当代中国一度出现过的对于胡适、俞平伯红学研究的评判运动。

赵美媛最后说，通过当代红学研究可以得到的教训是，学术研究不能以现实政治的直接、强迫的介入来进行，更不能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因为这是制约学术研究的自由而阻挡学术的整体发展的。

与胡适的“整理国故”思想有关的文章有金元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国故整理”问题检查》和朴英美的《对胡适的清代思想研究小考》。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期“国故整理”问题检查》一文中肯定了胡适认识中西两种方法之间的互相性，提出一套用来整理中国文化古籍的放大体系。然后金元中继续说，胡适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文化观念有所接触和借鉴，以进化论的眼光和历史观去看待国故问题。他采取的是科学的立场，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激烈的西化。朴英美的《对胡适的清代思想研究小考》是在韩国哲学论集上刊载的。文章详细说明胡适的国故思想与治学方法。这篇文章一方面肯定在对清代治学方法研究方面上胡适具有的启蒙意义，但同时亦怀疑基于胡适“大胆假设”的启蒙思想，难免不充分、不细心的分析与证明。

7. 胡适戏剧作品之比较研究

胡适的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中，朴鲁鍾的《李光洙“闺恨”与胡适“终身大事”的近代性比较考察》一文，以他们的作品与生涯来比较了韩国和中国近代戏剧的特点。

韩国高丽大学讲师袁淵姬在《胡适的“终身大事”里面的易卜生受容与变形》一文中，通过易卜生《玩偶之家》与胡适《终身大事》的具体原文分析，探索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利用及变换西方的文本，找出两部戏剧的交集点。易卜生在《玩偶之家》所强调的是女权和妇女解放——从玩偶到人、女生的变形，胡适则在《终身大事》中强调新旧矛盾。胡适写男人启蒙者帮中国的娜拉实现救援女人。虽然为胡适已经吸收了易卜生的戏剧当中有进步意义的部分，但还是再结构以男生为救援女人的神话，在这方面上娜拉的进步性已相对降低，可以说是褪色的角色，甚至带着退后的倾向。这意味着女权的丧失和中性化。

从1920年代以后开始，在韩国多样文献中出现过胡适的思想及其贡献。这足以证明韩国对胡适的关注。可是在韩国刊发的有关胡适的文章存在着范围和数量上的局限，即使胡适处于韩国对20世纪初新文学运动时期中国文化界代表人物中关注研究之中心。不过，与70年代末才开始研究的其他人物相比，对胡适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哲学到文学方面的成果更广泛。而且，根据各个学科积累的成果来，以更整体、有机角度来研究“胡适”的趋势在逐步呈现。

参考文献

（中）

《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北京。

《胡适书信集——上、中、下》，耿云志 欧阳哲生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

《胡适图传》，沈卫威 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格里德 著，鲁奇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南京。

（韩）

《尝试集》，胡适 著，韩相德 译，知做知（zkanz），2010年。

《中国现代独幕剧选》，胡适 著，韩相德 译，韩国学术信息，2007年。

《中国的自由主义实验——胡适的思想与活动》，闵头基，知识产业会，1996年。

《中国近代的文学意义形成研究》，洪昔杓，中国图书文学中心，2000年。

《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与实践》，李廷吉，韩国学术信息，2006年。

附录一：

韩国对胡适思想著述的介绍翻译（1920、1930年代）^①

作品类型	介绍人	题目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文学理论	梁白华	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	开辟	1920.11
	李允宰	胡适的建设文学革命论	东明	1923.04
	梁白华	谈新诗	东明	1923.05
	梁白华	最近五十年的中国文学	东亚日报	1923.08
	李允宰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文章	1941.01
文学作品	梁白华	上山	东明	1923.01
	李允宰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东明	1923.04
	梁白华	我的儿子	东明	1923.05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海外文学	1923.07
		十一月二十四日夜	海外文学	1927.01
思想著作	李像隐	杜威的思想论	现代评论	1927.05
	李像隐	实验主义	现代评论	1927.08
	不详	我们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态度	朝鲜之光	1927.12
	吴天锡	胡适氏的东西洋文明批判	新生	1929.06
	丁来东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朝鲜日报	1931.06
	申彦俊	实验主义者胡适	东光	1931.08
	不详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新生	1932.09
	吴天锡	西洋文明的精神性	新生	1933.10

^① 本附录参阅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2010年4月的硕士论文《胡适对韩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但对其进行了修改补充。

	金刚秀	孔子论批评	新兴	1935.05
	洪性翰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新东亚	1936.08
时代文章	不详	中国的进路是什么	新月	1931.01
	元世勋	敬告日本国民、答室伏高信先生	三千里	1937.01

附录二：

学位论文（18篇）

题目	副标题	作者	学习单位	年度	授予学位
胡适研究		李 峻	首尔大学大学院 中语中文学科	1969	硕士学位论文
胡适思想研究	关于他的中国的传统再评价	李钟洙	西江大学校大学院 史学科	1976	硕士学位论文
有关胡适的全盘西化 认识研究		禹钟淑	全南大学校大学院 史学科	1984	硕士学位论文
胡适思想研究		李洪吉	全南大学校大学院 史学科	1986	博士学位论文
关于五四时期新知识阶层的思想论争	以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为中心	金遇敬	高丽大学教育大学院	1987	硕士学位论文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研究		李光禄	庆熙大学校大学院 中语中文学科	1991	硕士学位论文
胡适的女性观一考察		崔炅熙	晓星女子大学校 史学科	1992	硕士学位论文
胡适的白话文学论研究	以语言意识为中心	权基永	延世大学校大学院 中语中文学科	1996	硕士学位论文
关于中国近代性文学意识形成的研究	以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和鲁迅的小说创造为中心	洪昔杓	首尔大学大学院 中语中文学科	1996	博士学位论文

胡适新诗研究		崔成卿	嶺南大学校大学院 中语中文学科	1996	博士论文
胡适的五四时期文学论	以新诗为中心	崔炅熙	东国大学校教育大学院中国语教育 教育专攻	1998	硕士论文
关于当代的问题来反思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	以孙文的国家理论与胡适的实验主义为中心	宋寅在	成均馆大学校大学院 东洋哲学科	2000	硕士论文
新文学运动反对论研究		金成翰	庆熙大学校教育大学院	2001	硕士论文
胡适之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与实践		李廷吉	忠南大学校大学院	2003	博士论文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的思想和活动	以欧美模式改革主张为中心	朴草恩	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历史教育	2005	硕士论文
胡适的个人主义研究	以个人的自由为中心	丘闵熙	成均馆大学校大学院东洋哲学科	2006	硕士论文
《新潮》的西化与学术志向研究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影响为中心	金仙映	梨花女子大学校大学院 中语中文学科	2010	硕士论文
胡适的文学史叙述研究	以《白话文学史》为中心	金惠珠	梨花女子大学校大学院 中语中文学科	2010	硕士论文

附录三:

期刊论文(44篇)

题目	副标题	作者	作者单位	学术杂志	发行单位	年度
胡适的文学革命影响与其受容面貌		李錫浩	延世大学校中文系教授	中国文学研究	韩国中国语文学会	1974
胡适给予近代韩国文学的影响	尤其以哲学和思想为中心	李錫浩	延世大学校中文系教授	延世论丛	延世大学校大学院	1975
胡适与新诗		河正玉	成均馆大学校中文系教授	淑大学报	淑明女子大学校学生委员会	1981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检讨		殷富基	京畿大学校教授	中国学报		1981
中国五四时期(1915~1919)个人主义思想研究	以胡适与陈独秀为中心	申聖旭	美国伯克利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东方学志	延世大学国学研究员	1981
胡适的文学改良论考察		徐義永	全南大学校师范大学	龙凤论丛	全南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2
胡适文学的受容过程		河正玉	成均馆大学校中文系教授	人文科学	成均馆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2
胡适与他的新文化运动		安秉均	京畿大学校教授	京畿大论文集	京畿大学校	1988
胡适与他的中国小说考证		崔溶澈	汉阳大学校中文系教授	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7号	韩国中国小说学会	1991
胡适,实用主义的实验		崔根德	成均馆大学校儒学课教授	哲学与现实	哲学文化研究所	1991
胡适的新诗运动考		金惠经		中国学论丛	韩国中国文学学会	1992
胡适白话文运动的源流		李廷吉		中国学论丛	韩国中国文学学会	1993
胡适的《尝诗集》考察		崔成卿	庆南情报大学教授	中国语文学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	1993
胡适与西洋文化受容		辛勝夏	高丽大学教授	梨花史学研究	梨花女子大学史学研究所	1993
胡适与诗和诗意识		金昭贤	东亚大学校中文系	石堂论丛	东亚大学校石堂传统文化研究所	1995
胡适新诗的空间构造分析		崔成卿	庆南情报大学教授	中国语文论丛第10辑	大韩中国学会	1995
自由主义的革命和胡适	以人权论为中心	白永瑞	延世大学校史学科教授	亚洲文化	翰林大学校亚洲文化研究所	1995
中国新文学上的鲁迅与胡适比较研究		朴云锡		中国语文学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	1997

1930年代初对“国难”的胡适和瞿秋白的对应	以9.18事变的对应为中心	孫承会		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科论集	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科	1997
新文化运动的里面的胡适文学理论研究		李俊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1998
胡适的新文学活动分析		李廷吉	舟城大学前任研究员	中国学论丛	韩国中国文学学会	2000
胡适的新文学方向	以“方法”为近代志向	洪昔杓	江陵大学校中文系教授	韩国现代文学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2000
中国的新诗革命与公安派影响	以胡适为中心	崔成卿	庆南情报大学教授	中国语文论丛第16辑	大韩中国学会	2001
胡适的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考察		金錫準	中央大学校中文系教授	中国语文学论集	中国语言学研究会	2001
通过《中国哲学史大纲》来看胡适的伦理观		李惠灵		哲学研究	哲学研究会	2002
胡适的“近代”受用与社会进化论		金尙源		中国文学研究	韩国中国语文学会	2003
胡适诗的抒情性研		崔成卿	庆南情报大学教授	中国语文论丛第20辑	大韩中国学会	2003
中国新诗表现的继承和移植问题研究		郑雨光	淑明女子大学校中文系教授	中国语言论丛	中国语文研究会	2003
胡适的历史的文化进化论再探		金尙源		中国文学研究	韩国中国语文学会	2004
胡适的《终身大事》里面的易卜生受容与变形		裴淵姬	高丽大学中文系讲课老师	中国学论丛	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	2004
胡适的“近代”受容与“文学革命论”		金尙源	汉阳女子大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人文科学	成均馆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	2004
胡适的白话传统文学继承		李廷吉	舟城大学前任研究员	中国学论丛	韩国中国文学学会	2005
文体改革与新文化运动	以胡适的“国语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为中心	金尙源	汉阳女子大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中国文学研究	韩国中国语文学会	2005
近代中国的脱中华主义		李惠京		今天的东洋思想	禮文东洋思想研究员	2006
五四白话文运动与语言意识形态	对待论解释的可能性初探	李賓卿		中国现代文学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2006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国故整理”问题检查	以胡适为中心	金元中	建阳大学校中国语文化学科教授	中国学论丛	韩国中国文学学会	2006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对胡适白话文学史观的检讨		金元中	建阳大学校中国语文化学科教授	中国人文学	中国人文学会(旧中国人文学研究会)	2006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		鲁长时	岭南大学中	东亚人文学	东亚人文学会	2006

“全盘西化论”试探			国语言文化 学部			
对胡适的清代思想研究 小考	以治学方法为中心	朴暎美		韩国哲学论集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2008
1920年代初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的政治活动	胡适的努力政治和 蔡元培的不合作政 治	金贞和		历史与谈论	湖西史学会	2009
胡适的白话文学论		李善玉		中国文学研究	韩国中国语文学会	2009
李光洙《闺恨》与胡适《终 身大事》的近代性比较考 察		朴鲁鍾	东义大学校	中国人文学会	中国人文学会	2009
对俞平伯与胡适的红楼 梦研究批判的考察		赵美媛		中国小说论丛	韩国中国小说学会	2010
近代红学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	以考证派的红学研 究为中心	赵美媛		中国语文学论集	中国语文化研究会	2010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胡适与孙中山

苏育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革命成果很快就落入代表保守势力的袁世凯手中。孙中山联合各省武力，后来又进行“二次革命”，开展护国和护法运动。1918年，孙中山回到上海，开始撰写《孙文学说》《事业计划》等重要著作，以此来统一全党同志的思想。

1919年5月，胡适在上海拜见了孙中山。

此前，胡适的老师、美国教育家杜威应邀到中国讲学，胡适与蒋梦麟、陶行知专程到上海迎接。5月初的一天，胡适与蒋梦麟一起拜访了孙中山。后来胡适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说：“有一天，我同蒋梦麟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他说他新近做了一部书，快出版了。他那天谈的话便是概括的叙述他的‘知易行难’的哲学。后来杜威先生去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说的也是这番道理。”胡适后来还说，在“他的寓室内书架上装的都是那几年新出版的西洋书籍，他的朋友，可以证明他的书籍不是摆架子的，是真读的，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

格，是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见《答唐山大学学生刘君信》）

这便是他最初见到孙中山的印象。

孙中山的著作，于本年6月由上海华强书局出版发行。鉴于胡适在学界以及社会上的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孙中山委托廖仲恺寄给胡适新出版的《孙文学说》，希望他能给以介绍和评论。廖仲恺7月11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前月承孙先生命，寄上新版书五本，未审收到否？孙先生拟烦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胡适回信答应写书评，很快就在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评〈孙文学说〉》一文，对孙中山及其《孙文学说》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介绍。评论说：

全书的主旨，在于打破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迷信，在于要人知道“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信仰。

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的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这部书的根本观念，简括说来，只有一句话：“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作者的意思是说，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从前不能得到的参考材料现在都能得到；从前无法计算的种种方面现在都可通盘筹算；此前决不能征服的困难现在都有征服的法子。在这个时候，若能用科学的知识定下一种切实的远大计划，决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从前不知尚且能行，现在有了正确的知识，行起来更容易了。

这是我对于这书大旨的赞成。

孙中山很快看到了胡适的评论，8月2日廖仲恺当即给胡适写了孙中山读后的感想，并对他的评论的作用给予足够的肯定。他在信中说：“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此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遭到北洋政府的拘捕，后来胡适继续主编的《每周评论》也被封禁，上海还传说胡适也同时遭到拘捕。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很关心胡适的安全，对北洋政府逮捕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带头人，表达了极大的愤慨。这时，孙中山正与北洋政府就南北议和进行谈判，

他一见到北洋政府的谈判代表徐世英，就说起胡适与陈独秀被捕的事，他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按：原文如此）；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徐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这就打电报去。没过几天，北京方面就把陈独秀放了。（见1919年12月16日沈定一给胡适的信）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段祺瑞临时执政，并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时，孙中山已身患有病，但为了国家与民族利益，他毅然同意，几经辗转于12月下旬到达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5号（今张自忠路23号）。第二年元月26日，终因病情加重住进协和医院，经诊断为肝癌，并接受了手术。至2月中旬，经院方治疗后宣告无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家属及周围友好同志认为，可以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和方法，来延长孙中山的生命。有人建议，既然西医无治，何不延请中医大夫陆仲安前来一试？又考虑到陆仲安曾治好过胡适的病，若由胡适向孙中山进言，或许他还是能接受的。大家推举李石曾（按：李曾在北大任过教）尽快去见胡适，然后延请陆仲安给孙中山治病。这时胡适恰好有事在天津，李石曾立即赶赴天津，向胡适说明来意，约他尽快进京。

这陆仲安何许人也？他给胡适治病又是怎么回事？

陆仲安（1882—1949年），北京著名中医，精于医道，先后在北京、上海行医，尤在上层多有名声。1920年秋天，胡适患水鼓胀（疑是糖尿病及肾脏炎），西医治疗无效，后经北大同事马幼鱼介绍，请中医陆仲安治疗，三个月后痊愈。此事在当时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西医对于中医药的治疗效果颇感惊异。有位著名的西医俞凤宾博士，曾收集陆仲安为胡适诊治的部分药方，撰写了《记黄芪治愈糖尿病方药》一文。有懂中医者，将陆仲安给胡适开的药方经过分析，认为药方本“不足为奇”，能取得奇效的关键，在于“黄芪和党参的用量”很大，各自竟多至十两。因陆仲安擅长运用黄芪、党参治疗疑难病证，人们戏称他为“陆黄芪”。此后，胡适与陆仲安多有来往，从《胡适日记》即可看出，他自己或亲戚有病，都到陆仲安家中请他诊治。如1922年11月15日记载：“病来了！十五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睡时又觉两腿筋肉酸痛。脚肿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有点怕。”11月17日：“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11月22日：“出城诊病，换一方，捡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

李石曾在天津见到胡适后的情况，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引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有如下记载：

胡初以推荐医生责任太重，有难色。后抵京见汪兆铭等，力言侍疾者均惶急万状，莫不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且以先生平时对胡甚客气，换一外人往说，或可采纳。胡乃携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曰：“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语至此，孙夫人在床边急乘间而言曰：“陆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语讫急握先生腕。先生默看，神情凄婉，盖不欲重拂其意，乃伸手而以面移向内望。孙夫人即转身往床之内方坐下，目光与先生对视。陆即开脉案处方……

据后来胡适告诉他的学生胡颂平，孙中山服用陆仲安的中药，初见成效；后来又诊治几次，但未见进步，终告不治，于1925年3月15日逝世。

孙中山去世后，从1926年初开始，历经三年多的时间，终于1929年6月在南京紫金山南麓建成了中山陵。1934年2月，胡适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开会，有天与朋友任叔永、莎菲夫妇出城到了中山陵，此前他只到过墓门，这次他们一起全都转了一遍。胡适感觉“墓地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若修墓直到墓前，除去那四百级石筑，即便游览，也可省不少的费。”在他看来，“今乃倾一时之才力，作此无谓的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

（作者单位：西安市文化局）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 2008 年开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 3—5 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即每年的 2、5、8、11 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每期印制 200 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 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